**五、“向明而治”：日本第一次远航”**

**1、殖产兴业：“官不可与民争利”**

江户幕府因“大政奉还”而正式寿终正寝，为幕府起草“讣告”的，是土佐藩士阪本龙马。1867年6月9日，阪本龙马和土佐藩（高知县）参政后藤像二郎一起，乘藩船“夕颜号”赴京。途中，阪本龙马向后藤象二郎提出了八条建议，史称“船中八策”：1、天下政权奉还朝廷、政令悉由朝廷发布；2、设上下议政局，置议员参赞万机，万机决于公议；3、以有才公卿诸侯及天下人材为顾问，赐予官爵，除以往有名无实之官吏；4、广泛开展对外交往，签定新约；5、折衷古来之律令，重新撰定无穷之大典；7、置亲兵守卫帝都；8、定金银货币与外国平均之法。“船中八策”获得后藤像二郎认同，他据此草拟了“大政奉还建议书”。

德川庆喜接到“建议书”后，于10月14日向朝廷提出了奉还政权的上表。10天后又呈交了将军辞表。之后，德川庆喜将自己关在东京宽永寺的一间屋子里“谨慎”，即闭门反思15日。

2011年8月某一天，我在德川庆喜闭门反思的屋子里，采访了德川家康第十八代宗孙德川恒孝。我问他：“您认为德川幕府第一任将军德川家康和最后一任将军德川庆喜，有什么共同点？”德川恒孝的回答是：“他们都是为了国家的和平。德川家康使国家进入元和偃武的时代，德川庆喜辞去将军职务在，则是因为当时萨摩（鹿儿岛）、长州（山口）两个强藩虎视眈眈，如果他不那么做，日本将陷入内战的混乱，将使无数生灵涂炭。”

1868年1月3日，天皇睦仁宣布接受德川庆喜奉还大政、辞退将军的请求，废止原来以摄政、关白为首的朝廷组织，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从而掀开了明治维新的第一页。

4月6日，睦仁天皇在紫宸殿率公卿诸侯，以向神明宣誓的形式颁布了新政府施政纲领“五条御誓文”：1、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2、上下一心，盛行经纶；3、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勿使人心倦怠；4、破旧有之陋习，秉天地之公道；5、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五条御誓文成为明治维新的号角。不难发现，五条御誓文核心内容在坂本龙马的“船中八策”已有体现。

4月21日，新政府颁布了“政体书”。“政体书”分“政体”和“官职”两部分，“政体”共11条，第一条即“五条御誓文”；第二条提出三权分立原则：“太政官之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等三权，以免政权偏重之患。”

7月17日，新政府以天皇的名义下诏，将原幕府统治中心江户改为东京。诏书写道：“今后改称江户为东京，此乃朕之海内一家，东西同视也。”翌年3月，新政府正式迁都东京。

9月8日，天皇睦仁根据取中国古籍《易经·说卦传》中“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一句，改元“明治”，并规定“自今以后，一世一元，永为定制。”以往一个天皇有几个年号，自此成为历史。实际上，不仅“明治”，“维新”一词也出于《诗经·大雅·文王》：“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明治维新主要贯彻三大方针：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

1874年5月，大久保利通向政府提出了《关于殖产兴业的建议书》，其中写道：“大凡国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系于财产之多寡。物产之多寡，虽依赖于人民致力于工业与否，但寻其根源，又无不依赖于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力。”但实际上，在这份建议书提交之前，殖产兴业已经开始。

殖产兴业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868年明治新政府成立至1873年“明治六年政变”，主要内容和特征是由维新政府全面主导，运用没收的原幕府经营的工业企业进行军事工业建设。**重点经营官营事业**，特别是经营铁路和矿山。**改良和引进技术，创办“模范工厂”**。

第二阶段自1873年“明治六年政变”至1881年“明治十四年政变”。主要内容和特征是以英、德为楷模，在工农业各个领域大力推进殖产兴业政策。在19世纪80年代初，**殖产兴业指导方针和政策从政府全面主导，向“官营民营并举”转换**。将一些官营企业转为民营企业，是实行这一转换的标志。

第三阶段自1881年“明治十四年政变”至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基本内容和特征是以发展纺织、水泥、玻璃、制糖等产业和经营矿山为重点；继续贯彻“官民并举”方针，廉价出售国营企业，大力扶植私人资本主义成长。以三井为代表的江户时代的“政商”即特权商人，开始从政商转变为财阀。同时，以三菱为代表的新兴“政商”也开始向财阀转化。

殖产兴业的主导者是“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认为，明治政府首先必须完成的课题，是迅速实现富国强兵、维护民族独立。按照他的看法，虽然完成这项课题必须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产业技术等以充实经济实力。但是，仅仅**依靠移植机械工业和西方先进的金融制度**等，并不能达到预期目标。他强调，必须**努力实现原有产业的现代化，努力扶植民营企业**。因此，他提出的殖产兴业政策思想和理论，是首先实现已有产业现代化，由“民富”达到“国强”。在《关于殖产兴业的建议书》里，大久保利通明确而具体地表述了这一思想：“大凡国之强弱基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虽物产之多寡胚胎于人民是否勉力于工业，但若追根溯源，则未尝不依赖于政府政官之诱导劝奖之力。”

但是，未及将思想付诸实践，大久保利通便遇刺身亡。1878年5月14日，大久保利通在乘马车上朝途经纪尾井町时，被石川县士族岛田一郎等6名刺客袭击而丧命。之后，大藏卿大隈重信成为殖产兴业政策的主要制定者。

大隈重信继承了大久保利通的思想理论。1880年9月，大隈重信提出了“出让为劝业而设置的工厂之议”。主要内容是，除了对实施国家统治至为必要、不可或缺的器具制造工厂，如军工工厂以及造币所等仍须由政府直接经营外，一般企业可通过出售改为民营。大隈重信的建议反映了政府中枢的共识，因此即刻得到广泛赞同。同年11月5日，明治政府制定了《工厂出售概则》，着手将大隈重信的构想付诸实施。

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迄今头像仍印在10000日元上的“国民教师”福泽谕吉，也持同样思想。他强调，“政府若为了富国，就认为可以做任何事情，与人民从事相同的寻常事业，甚至与人民竞争工商之成败，其弊极矣。”

“官不可与民争利”的思想，对**殖产兴业的成功和日本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明治维新另两项方针，即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意义同样不可估量。下节课，我先谈一下文明开化。

**2、文明开化：“世风一新”**

“文明开化”由“文明”和“开化”两个词语构成。文明一词，“文明”一词，典出《书·舜典》“睿哲文明”。“开化”一词，典出顾恺之《定命论》“夫建极开化，树声殆则”。 福泽谕吉发表于1867年的《西洋事情》，首次将civilization译为“文明”。1868年，福泽谕吉将他开设于中津藩的塾舍迁往今天东京港区三田，取名“庆应义塾”。庆应义塾即今天的庆应义塾大学，通称庆应大学，是日本第一所近代化大学。

所谓“文明开化”包括四重含义：1、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即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期；2、作为一种**思想**，主要是启蒙思想；3、以教育政策为中心、作为**政府政策**的文明开化；4、以洋房、洋服等为代表作为**世态风俗**的文明开化。

学术界对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文明开化期始于明治初年，看法基本一致，但终于何时却意见不统一，大致有明治八年说（1875年）、明治十年说（1877年）、明治十四年（1881年）。但不管持哪种观点，都赞同以自上而下的开明政策同自由民权运动的对立，作为认识这一问题的基础。

作为启蒙思想的文明开化，当以福泽谕吉及其《文明论概略》为代表，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以基佐和巴克尔的学说为范本的主智主义文明史观。按照福泽谕吉的定义：“所谓文明，就是指人的安乐和品行的进步。由于能获得这种安乐和品行的是人的智慧和道德，因此所谓文明，归根结底就是人的智慧和道德的进步。” 二、智慧和道德进步的差异，使人类历史可以被分为三个阶段：野蛮、半开化、文明。非洲等属于第一阶段；土耳其、日本、中国属于第二阶段；欧美诸国属于第三阶段。因此，要取得智慧和道德的进步，必须“脱亚入欧”。三、人类所有善的东西均归因于有智，所有恶的东西均归因于无智，因此必须加强学习，并为此撰写了《劝学篇》。福泽谕吉在这本书中指出：“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人与人之间之上下贫富差别，皆因学与不学造成。学而为贤为智，不学而为愚。亚细亚和欧罗巴文明所以不同，主要就是由于学习精神不同。四、国家由政府和国民组成。政府和国民是契约关系。但“日本唯有政府而没有国民”，因为日本文明程度不高，缺乏能当好主人的国民，因此日本只能施行“君民同治”的君主立宪制，不能施行“万民共治”的民主共和制。

作为政府政策的文明开化，主要是兴办近代学校。1869年8月，明治政府接办幕府的昌平学问所、开成所、医学校，将其合并，总称大学校，并继续各校原有特点：昌平学校讲授汉学(儒学)、“国学”，开成所讲授“洋学”，医学校讲授西方医学。开成所为南校，医学校为东校。之后，大学校改成“大学”。1871年7月，明治政府改“大学”为“文部省”。1872年9月5日，文部省颁布了教育改革法令——《学制》，规定学制的基本原则为普及4年制义务教育和加强科学教育。同年，明治政府在东京设立了男女师范学校。1874年，在大阪、宫城、爱知、广岛、长崎、新泻等地也设立了师范学校。有些地方还设立讲习所、养成所等，以迅速造就师资。1877年1月，工部省改工学寮为工部大学校。同年4月，合并大学南校和东校建立东京大学（后改称东京帝国大学)，设法、理、文、医四个学院。1879年，划一的具有强制性的《学制》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注重各地实际情况的《教育令》。另外，明治政府还颁布了《海外留学生规则》，奖励留学。

作为世态风俗的文明开化，和明治政府的政策直接相关。1871年，明治政府为“移风易俗”，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如“断发脱刀令”规定武士须剪去“丁字头”，改为剪发，解除佩刀。1872年12月，明治政府颁布法令，废止幕府时期的常礼服(狩衣、直垂袜)，定西式礼服为官员礼服。禁止作为处罚的“切腹”和“混浴”，以及使用太阳历，也始于这一年。

另一方面，作为世态风俗的文明开化，也是将西方舶来品均视为“文明”的社会风潮。加藤佑一写于1873年的《论文明开化的意义》一文，对这股风潮有如下描述：“盖文明开化之事，如人们的口头禅经常提起。然真正理解文明开化之含义的人并不多见，若问何以如此评论，曰在世间经常可以听到，吃猪肉被视为文明，打着蝙蝠伞在路上行走更是了不起的文明；穿着皮鞋直接踏上榻榻米，是给人带来点麻烦的文明，更不用说牵着的狗也踏上榻榻米；毁坏佛坛是了不起的文明，模仿西洋人的、耳之所闻眼之所见的新的事物，只要与他人不同，全都成了文明开化。”

随着文明开化的进行，不仅世态风俗出现了深刻变化，而且人们的生活习惯也开始发生显著改变。住洋房、点煤油灯，吃西餐的人日益增多，被贱视的猪牛肉、牛奶成为上品。

在文明开化方针指导下，报纸、杂志等近代媒体纷纷问世。1870年，日本最早的日报《横滨每日新闻》、《海外新闻》创刊。随后，《东京日日新闻》、《邮便报知新闻》、《日新真事志》等相继发行。以1874年《成立民选议院建议书》为转机，报纸开始出现社论。《读卖新闻》（1874年）和《朝日新闻》（1879年）发行后，报纸开始从以政论为重点，转向以新闻报导为重点，并加强了群众娱乐性。之后，《西洋杂志》作为日本最早的杂志发行，所刊文章多数由柳河春山等“洋学家”投稿，并多数是荷兰学术杂志的译文。此外，在著名的杂志中，政治类有作为明六社舆论阵地的《明六杂志》；经济类有田口卯吉创办的《东京经济杂志》（1879年）；自然科学类有杉浦重刚、井上哲次郎等创办的《东洋学艺杂志》（1881年）。另外还有主要以女性为对象的《女学杂志》（1885年），等等。

1872年京浜(东京——横浜)、阪神(大阪——神户)等铁路线相继通，1869京浜直达电报开通，1877年本地电话通话，都是文明开化的成果。

明治政府在推行“文明开化”的同时，也注意维护传统意识，尤其注重于强化**“皇权”意识和“神国”意识**。1868年3月，明治政府颁发“神佛判然令”，支持神道教的“废佛毁释”运动，使神道“国教化”。新政府在取消传统的端午、 七夕、重阳等传统节日的同时，新设天长节(天皇诞辰纪念日)、纪元节(初代天皇神武天皇即位纪念日。战败后改为“建国纪念日”)、神武天皇祭、神尝祭(天皇献新谷于宗庙的节日)、新尝祭(天皇献新谷于天地并亲尝以祝丰收的节日)等崇拜天皇的节日。

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推进都比较顺利，但是富国强兵的推进不仅不顺利，而且引发了一系列武装冲突。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且继续收看下节课——“富国强兵：颠覆秩序的改革”。

**3、富国强兵：颠覆秩序的改革**

“富国强兵”的本质是废弃武士身份世袭的兵农分离制，重点是军制改革。

早在明治元年，即1868年的10月17日，伊藤博文便提出了《统一兵权之建议》：“若普天之下皆为王土，率土之滨皆为王臣，则诸侯之兵，皆为天子之兵。若天子能予号令，则当能动员百万之众。然方今朝廷名义上拥有兵权，实际上兵权为诸侯掌控，故朝廷力弱无以驭下，今若能立此制，则将终中古以来之制，朝廷能乘机使北进之兵成朝廷之常备部队，总督、军督、参谋以下者，若赐以爵位，授以兵权，使其能号令部队，则兵士各得其所。若能博采欧洲各国兵制所长改革我兵制，由朝廷亲自统御军队并加以训练，则兵士将更加骁勇，愈益刚强，内制不逞，外对万国而不耻，巍然伫立。诸将士当感戴君子亲临之恩，乐于服从，方今一新之际，文武二权复归天子，然后张扬皇威国威，成复古之势，一则处理征讨之兵，二则帮助当今朝廷，三则四海炫耀国威，此乃当今之急务，望经朝野之公议察其裨益。”

在伊藤博文等人的推动下，1872 年12 月28 日，明治政府向全国颁布《征兵告谕》，取消了武士垄断军人身份的特权，实行仿效西方的义务兵役制。《征兵告谕》宣布：“我朝上古之制，海内皆兵。有事之日，天子为帅，征募堪服兵役之丁壮，以征不服。解役归里，或衣或工，或为商贾，本无后世佩带双刀称作武士，以至坐食抗颜尤甚，杀人而官府不问其罪者。然大政维新、列藩奉还版籍，至辛未之岁（1871年），远复郡县之古，许世袭坐食之士减其禄，脱刀剑，四民渐得自由之权，是乃上下平均，人权齐一之道，兵农合一之基。至是，士非从前之士，民非从前之民，均系皇国一般子民，故报国之道也当本尤其别。乡长、里正当厚奉此意，依照征兵之令谕说庶民，使知保护国家之大本也。”

1873年，明治政府颁布了《征兵令》，仿效法国建立陆军，仿效英国建立海军，即建立了近代常备军并建立军校培养军事人才。同时，明治政府还改建和扩建军事工厂，努力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为军队提供新式武器装备。

武士曾经是江户时代的政治基础，很多武士为明治新政权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进入明治时代后，他们却作为“供品”被明治政府奉上了祈求近代化的祭坛。虽然对他们而言，如此待遇确实冷酷无情。**但历史发展的辨证规律要求武士必须作出这一牺牲，这是他们的宿命。作为社会整体，封建的武士必须消亡，因为日本需要新生。**

正如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写道的，“新生的明治政府的这些重大改革是不得人心的。在当时，一般人对1871年至1873年的侵略朝鲜（征韩）远比对这些措施更有普遍的热诚。明治政府则不仅没有动摇其彻底改革的方针，而且否决了侵略朝鲜的计划。政府的施政方针与绝大多数为建立明治政府而奋战者的愿望强烈对立，以至在1877年，这些对立派的伟大领导人西乡隆盛组织了大规模的反政府叛乱。”本尼迪克特所说的“西乡隆盛组织了大规模的反政府叛乱”，是指日本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内战——西南战争。

1873年6月至10月，日本统治阶层围绕是否应出兵朝鲜，发生了一场冲突，史称“征韩论争”。这场争论以主张征韩的西乡隆盛等辞职下野，大隈重信、伊藤博文等反“征韩”势力全面扩张告终。这一政治变局发生于明治六年，史称“明治六年政变”。当时，相当于卫戍司令的近卫都督西乡隆盛提交辞呈，并和追随他的陆军少将桐野利秋、近卫局长筱原国干少将等数十人返回故里萨摩藩，也就是今天的鹿儿岛县。

1874年6月，西乡隆盛等在当地设立了 “枪队学校”和“炮队学校”两所私学校。另外还设立了士官预备学校“幼年学校”。“私学校”成立后规模不断扩大。仅时过一年，学生人数即达3万左右。

西乡隆盛在鹿儿岛建立“独立王国”的动向，自然引起政府警觉。1877年1月初，政府决定将当地陆军炮兵附属兵工厂的大炮和炮弹移往大阪炮兵分厂，引起私学校学生强烈不满，纷纷要求西乡隆盛“蹶起”。但是，西乡隆盛态度消极。于是，私学校的激进派决定自己行动。据史料记载，1月29日深夜，以松永高美为首的约20名私学校学生冲进弹药库抢夺弹药，并将武器弹药运至各分校和学生家中，使前来装运武器弹药的船只空船返航。眼见事态严重，西乡隆盛等人彻夜进行了研究，并对这种轻率举动表示愤怒和谴责。

但是，2月6日发生的一件事，使西乡隆盛完全改变了态度。这天，当警察的私学校学生中岛健彦奉大山县令的命令，率数百名私学校学生将回到县里的东京警视厅警察中原尚雄等19人逮捕。经过严厉审讯，中原尚雄等招供，此次返乡系奉“大警视”川路利良的命令，前来刺杀西乡隆盛。见中央政府居心如此险恶，西乡隆盛终于决定“蹶起”，并在私学校建立了司令部。

2月19日，明治天皇颁布了征讨暴乱诏书，任命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征讨总督，陆军中将山县有朋、海军中将川村纯义为征讨参军。2月25日，政府发布了“逆徒征讨布告”，开始全面“平乱”。

战事最初围绕熊本城的攻防激烈展开。最后，西乡隆盛的军队终不敌政府军几路夹击，被攻破城池。4月17日，征讨总督有栖川宫入城。但是，西乡军仍顽强抵抗，在接连战败、被政府军包围后，8月15日，四面楚歌的西乡隆盛、桐野利秋等撤至鹿儿岛、占据城山，试图与政府军进行最后的决战。

9月12日，山县有朋下令炮击城山，并劝西乡军投降，称否则将于翌日下午4时发动总攻。西乡隆盛对这一要求断然拒绝。9月23日夜，明月当空，准备拼死一搏的西乡隆盛与众将士开宴诀别。诸君饮酒吟诗，尽了此生最后的欢乐。

9月24日下午4点，政府军发炮三响，如期发动总攻。西乡隆盛率属下将士奋力突围，但政府军2400名狙击手的枪弹如密集细雨，使他们无法穿越。西乡隆盛腹部和腿部均被子弹击中，无法站立，于是，跪着要求属下别府晋介将他杀死，并严肃地合掌向东方迢拜。别府晋介万般无奈，只得从命，悲痛地大喊一声：“恕我罪过！”挥刀将西乡隆盛的头颅砍下。最终，城山陷落，西乡隆盛、桐野秋叶等约160名将士阵亡，200余人投降。历时7个多月的西南战争结束。

1889年，睦仁天皇诏令撤销西乡隆盛制造“叛乱”的罪名，为其恢复名誉，并追赠正三位。1898年，日本政府在东京上野公园为被誉为“最后的武士”的西乡隆盛建立了一尊铜像，供后人瞻仰。1977年西南战争百年纪念，鹿儿岛县专门建立了“西乡南洲显彰馆”。

除了“三大方针”，明治宪法的制定和教育敕语的颁布，即“法治”和“德治”并举，作为“在历史坐标上解析日本”的重要内容，将在下一课讲授。

**4、“法治”和“德治”并举**

西南战争结束后，西乡隆盛的主要政治对手大久保利通表示，明治国家结束了“兵马骚乱”的第一期，迎来了“整内治、殖民产”的第二期。为此，大久保利通遂着手解决一系列政治课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以天皇制为基轴，对以天皇为核心的国家统治机构进行全面改革，赋予天皇实权，树立天皇的权威。

纵观历史，天皇的权力在天皇制不同阶段很不相同。据史家查证，“天皇制”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共产国际在1932年制定的《关于日本的形势和共产党的任务的纲领》。该“纲领”写道：“日本的天皇制，一方面主要立足于地主这一寄生的封建阶级，另一方面还立足于正在迅速致富的贪婪的资产阶级”。“我们的最终目的虽然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首先必须进行废除天皇制和重新分配地主阶级财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扫清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

天皇制经历了**以“大化改新”的贯彻为标志建立的古代天皇制**；**以《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为标志确立的近代天皇制**；**以战后《日本国宪法》的制定为标志发端的象征天皇制三个阶段**。

“大化改新”以发生于公元645年6月的一场宫廷政变为开端。大化改新的基本精神是仿效中国隋唐律令制，参酌日本旧习，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

在古代天皇制阶段，天皇的权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天皇作为神，本身是无姓的，但却是赐“姓”的唯一主体，是构成政治身份和经济秩序的根本。第二，天皇是授予“位阶”的唯一主体。而拥有位阶则是掌握特定的国家权力、享有特权者。第三，律令制国家统治阶级在作出重大决定时，整体意志必须通过由天皇颁布“敕令”、“诏书”等形式体现，即便那仅仅是一种形式。天皇颁布敕令、诏书主要是外交事务、册立皇太子、皇后、任命右大臣以上官员、授予五位以上冠位、与朝廷相关的重大事项。按照政治学理论，最明确显示是否拥有国家主权的主要指标，是**军事权和外交权**，在日本的古代官制中，没有司掌这两方面权力的独立的部或省。这两项权力由天皇直接掌控。

在武家时代，政权由幕府将军掌控，天皇没有实权。对天皇在当时的地位，学界主要有三种理论。一是“天皇封建领主论”即天皇仅是一个处于京畿的封建领主。二是“大义名分论”，即强调自古以来天皇始终是权威。三是“大政委任论”，即幕府受天照大神委托管理国家，服从幕府就是贯彻天照大神的旨意。

作为明治维新开端的“王政复古”，并不是要恢复古代天皇制，而是**要确立近代国家政治体制，确定天皇的权威**，而任何一种政治体制的建立，均依存于某种政治原理。明治宪法体制的形成所依存的，是西方政治原理。在建立近代天皇制的整个过程中，受穆勒等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影响，主张仿效英国实行“君民同治”的小野梓等“英学”家的理论；受鲁索等法国启蒙思想家影响，主张“万民共治”的中江兆民等“法学”家的理论；受布伦齐利等德国国权主义思想家影响，主张“主权归一”的井上毅等“德学”家的理论的相继提出，对《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制定，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无论“英学”、“法学”,还是“德学”的拥趸，均对天皇制不仅不予否定，而且给予高度尊重，并均以尊重天皇制为前提，探讨如何建立新的国家政治体制。最终，以井上毅为代表的“德学家”的思想理论，为日本最高统治阶层所采纳。几经修改，由伊藤博文主导，井上毅、伊东巳代治、金子坚太郎负责起草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终获通过。

1889年2月11日，即“纪元节”（纪元节1966年改为“建国纪念日”）上午10点30分，明治政府在宫中正殿举行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又称《明治宪法》）颁布典礼。典礼上，首先由明治天皇朗读“上谕”，然后亲手将宪法文本交给明治政府第二任首相黑田清隆（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此时已转任枢密院议长）。这一仪式本身即确定了《大日本帝国宪法》为“钦定宪法”的性质。《大日本帝国宪法》的最大特点是**明确规定赋予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和集政治、军事、法律、外交大权于一身的无限权力**。“宪法”第一条明确宣布：“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其余各条具体规定了天皇拥有包括军队统帅、法律裁决、官吏任免等各项权力。

明治宪法颁布第二年，即1890年10月3日，在“以法律取代道德”的社会风潮中，明治天皇颁布了《关于教育的敕语》（简称《教育敕语》 ），实际上强调了道德的不可替代性。颁布《教育敕语》的基本目的，**是培养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道德观，建立天皇制家族国家主义体制**。

在明治宪法体制确立后，日本便发动了第一次侵华战争：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并以甲午战争的“战果”为基础，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下一课，我就讲一下彼此有内在关联的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5、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占据“像一把匕首指向日本列岛的”的朝鲜，继而进犯中国，日本蓄谋已久。1792年，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中提出，“首取鞑靼，次图朝鲜、支那”。

1894年6月5日，日本在参谋本部内设立了大本营。6月下旬，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给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发了电报，称:“日清两国之冲突终于难以避免的时刻已经来临。”

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军舰击沉中国清军运兵船“高升”号。8月1日，中日双方彼此宣战，战争全面爆发。值得注意的是，清朝光绪皇帝颁布的《上谕》依据的是华夷秩序思想，称“朝鲜为我大清藩属二百余年”，而日本明治天皇则强调“不违反国际公法”，称朝鲜是“与列国为伍之独立国”，可见在舆论战中，清朝已未战先输。

甲午战争始于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持续近9个月，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在黄海海战中，中国损失了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共5艘军舰；第二阶段是九连城之战和旅顺口之战。由于渤海门户旅顺口被占领，中国清朝军队极度被动。第三阶段是威海卫之战和辽东之战，中国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

1895年3月20日，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在日本山口县下关的春帆楼开始进行停战谈判。由于停战条件过于苛刻，李鸿章表示无法接受，提出直接进行媾和谈判，日本最初没有答应，但因李鸿章在回饭店途中遭到反对议和的日本浪人小山六之助（本名丰太郎）狙击并受伤，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担心，如果李鸿章愤而回国，将引起国际舆论对日本的谴责，于是要求天皇颁布“朕对此深表遗憾”的诏敕,向清朝政府和李鸿章本人表示歉意，并立即表示无条件停战。

1895年4月17日，双方在春帆楼签署了《媾和条约》，通称《马关条约》。条约共11款，并附有“另约”和“议订专条”，主要内容是：1．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自主，废绝中朝宗藩关系。2．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3．赔偿日本军费二亿库平银（1库平银 = 37.3克）。4．开放重庆、沙市、苏州和杭州为商埠。5．日本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但是，4月23日，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相继造访日本外务省，提出：“若辽东半岛为日本所有，不仅有直接危及清国首府之虞，且将使朝鲜之独立有名无实，成将来远东永久和平之障碍”，对日本要求清朝割让辽东半岛表示抗议。

面对三国干预，日本御前会议经反复讨论后决定，“即便对三国全面让步，也不可对清国退让一步。必须努力使三国政府之干涉事件和清国条约批准事件互不牵连，当将两者分割，采取各单独处置的方针。”在向清朝索要了3000万库平银后，日本归还了辽东半岛。

甲午之战，为何泱泱华夏败于蕞尔岛国？我认为，主要有几方面原因。

1. 国防战略失误。1868年7月14日，刚登基的明治天皇睦仁接到了一

名军务官建议加强海防的奏折。接此奏折，睦仁当即颁布诏书，强调：“海军之事为当务之急，应从速奠定基础。” 但是，清朝当时却重“塞防”而轻“海防”。1886年后，清朝将原本不多的海防经费的三分之一挪至东北充实“塞防”，未能觉察早已觊觎中国的日本。

第二，虽然中国和日本分别开展了以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发展近代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和殖产兴业，但两者形同实异。日本殖产兴业贯彻的是“官不可与民争利”的路线，而中国洋务运动贯彻的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即官商一体的路线。

此外，用人不当，军备松懈，贪污腐败，外交失策，也是甲午战败的原因。

甲午战争对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三国干涉还辽”使日本朝野深受刺激，决意“坚忍不拔，卧薪尝胆”，推行“以军备之大扩充为中心”的路线，而根据《马关条约》获得的相当于当时日本年财政收入4.87倍的2.3亿库平银，则为推行这一路线提供了物质基础。数据显示，日本军费开支在财政开支中的占比，1893年为9.8%，至1900年则升至17.3%，增长近1倍，日本产业结构也因军工需求而发生深刻变化。

甲午战后，由于日本在远东地区不断扩张，和俄国的矛盾日趋激化。1902年 10月初，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向俄国驻日公使罗森提出了“满韩交换”论，建议日俄相互承认，“满洲不属于日本特殊利益范围，韩国不属于俄国特殊利益范围”。但是，日本的提议遭到俄国政府拒绝。1903年2月4日，日本御前会议作出对俄开战决定。2月10日，日本天皇颁布了《宣战诏书》，俄国也与当天对日宣战。由于日本取得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三大战役，即旅顺战役、奉天战役、日本海海战的胜利，最终锁定了胜局。

在三场战役中，日本海海战是日本最主要的吹牛资本。1905年5月14日上午，由罗泽德斯特凡斯基海军上将指挥、由50艘战舰组成的波罗的海舰队驶出金兰湾，于27日下午1点55分与东乡平八郎指挥的日海军联合舰队在对马海峡遭遇。面对俄军舰队，日海军联合舰队旗舰“三笠”号打出了“Ｚ”信号旗，这是联合舰队司令官东乡平八郎向全舰队发出的作战指令：“皇国兴废在此一战，全体官兵奋勇努力！”原来，东乡平八郎曾留学英国，颇为仰慕曾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大败法西海军联合舰队的霍雷肖·纳尔逊将军。他的这个旗语即改编自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决战前打出的旗语：“英格兰期盼每个男儿恪尽职守！（ England expects that every man will do his duty！）

在日本海海战中，东乡平八郎采用了日本海军士官学校教官秋山真之首创的

“丁”字战法，使日军舰只横向展开呈“一”字队形，集中各舰炮火，逐一轰击呈纵向前行呈“|”字队形的俄军军舰，将其逐一击沉。第二天，战事基本结束。结果，俄军舰队38艘战舰被摧毁或捕获，而日本联合舰队仅损失3艘鱼雷艇，成为世界海战史上损失最为悬殊的一场海战。  
  波罗的海舰队被歼灭后，美、德两国劝沙皇尼古拉二世媾和。1905年6月7日，沙皇政府通过美国驻俄公使，表示了愿意和日本直接媾和的意向。8月9日，由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斡旋，日方全权代表、外相小村寿太郎和俄方代表、前财务大臣贝蒂举行了预备性会谈。在会谈过程中，俄国代表贝蒂故意将日本提出的媾和要求泄露，试图通过媒体换取美国对俄国的同情。这一招果然奏效，获悉日本贪得无厌，美国舆论从最初的反俄亲日转变为对日批判，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原先答应给日本的援助也因此被取消。对贝蒂在外交方面的老练，《明治天皇纪》第11卷有这么一句评语：“三寸不烂之舌能抵十万雄兵”。结果，日本除了不得不放弃12亿日元的战费赔偿外，原先要求割让的库页岛（俄国称萨哈林、日本称桦太）也不得不“减半”： 8月29日，在谈判几近破裂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向小村寿太郎发出训令，让他在谈判中对俄方作出让步，将“桦太”，也就是库页岛北半部无条件划归俄国。

最终，经过8月10日至9月5日共17次会谈，双方代表在会谈的最后一天，即9月5日，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签订了《日俄媾和条约》，史称《朴茨茅斯条约》。条约规定，俄国承认朝鲜是日本独占的势力范围；俄国将包括中国旅顺和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租让权及由长春至旅顺的南满铁路的租让权转交给日本；以北纬50度为界，俄国将库页岛南部和邻近岛屿割让给日本。自此，俄国势力被逐出朝鲜半岛。

到今天为止，有关明治时代的课程全部结束。从下节课开始，我们将在历史的坐标上解析大正时代的日本，了解日本如何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国侵略扩张。

**六、“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1、“天皇机关说”**

这一章我主要在历史坐标上解析日本的大正时代。大正时代在日本历史上仅仅存在了15年。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会主编的《近代日本思想史》。将大正时代称为“一朵美丽而虚幻的花”。但是我们必须明确，**大正时代是继明治时代以后模仿欧美政治体制、模式，进一步推进议会民主的重要时期**。必须明确，在日本近代史上，**民主运动浪潮**仅仅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明治时期的自由民权运动，第二次是大正时代的大正民主运动**。

“民主”一词源于希腊语，意思是“人民治理”，即“主权在民”。但是，根据1889年所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天皇是神的后代，是日本万世一系的统治者，具有从“神代”以来亘古不变的对日本国及其国民的统治权。国家的主权属于天皇。这一理论就是所谓的“**天皇主权说**”。但是，38岁的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科教授美浓部达吉根据当时在民主国家盛行的“主权在民”说，认为国家的统治权归属于国家法人，天皇是日本全国各法人机关的最高领袖，是一个执行主权的机关。

关于“**天皇机关说**”的提出经纬，美浓部达吉在发表于《太阳》杂志大正元年（1912年）7月号上的《国体及政体论》一文中有明确叙述：“去年7月，我受文部省委托，在文部省召开的中学教员讲习会上讲述了帝国宪法之大要。后对笔记进行修正增补，作为我的个人论著发表，题为《宪法讲话》。出乎预料的是，我关于此等根本问题之见解，遭到了某些人的严厉批评，称我的学说是‘关于国体的异端邪说’，数种新闻杂志也刊载这种抨击并大声疾呼，当‘尽力排斥这种思想。’”

“某些人的严词抨击”，是指美浓部达吉的同事、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上杉慎吉根据“明治宪法”中“天皇亲裁”的有关条文规定，在《太阳》杂志同年6月号撰文提出的批判。上杉慎吉亦是东京帝大的“少壮派”，比美浓部达吉更年轻，当时年仅33岁。他所以撰文提出批评，不仅是为了维护天皇的尊严，同时也是为了维护他的恩师穗积八束的权威。穗积八束曾长年主张“国体论”即“天皇主权说”，但随着政党势力的兴起，这种学说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因此他时常发出“孤城落日之叹”。阅读了弟子的论文后，穗积八束从疗养地镰仓专门写信给上杉慎吉给予称赞和感谢，并呼吁文部省禁止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流传。但是，当时执政党首领、内阁总理西园寺公望正想限制天皇权力，为扩大内阁权力寻找法律依据，所以对穗积八束的呼吁几乎不屑一顾。于是，美浓部达吉和上杉慎吉围绕这一的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引起广泛关注。政界和学界人士认为美浓部达吉言之有理者居多，甚至包括国粹主义者、检事总长（总检察长）平沼骐一郎。此后，天皇机关说一直是明治宪法的主流解释，直至昭和十年（1935年）被统治当局彻底否定。

就在这场激烈争论呈白热化状态时，1912年7月20日，日本宫内省发表了天皇健康状况公告：明治天皇睦仁因患尿毒症，生命垂危。7月30日，明治天皇驾崩，享年59岁。

明治天皇的驾崩，宣告了明治时代的终结。夏目漱石在小说《心》中，极具代表性地表达了当时的日本国民因明治天皇的驾崩而感觉到的时代的更换：“明治天皇驾崩了。我感到明治的精神始于天皇，也终于天皇。” 著名散文家德富芦花以悲怆的笔调，描述了他内心的震颤：“陛下之驾崩掩上了明治之史册。明治变为大正，我感到仿佛是我自己生涯的中断，感到明治天皇携着我的半生驾鹤西行。”被奉为“军神”的日军大将乃木希典和他的妻子乃木静子双双切腹自杀，为天皇殉葬。

明治天皇的“驾崩”不仅对日本国民的心理和感情是一大冲击，更是对以明治天皇为中心的明治宪法体制的一大冲击。明治天皇的皇后一直未能生育，其他的妃子生有5子10女，但除了第三个儿子嘉仁以外，其他儿子全部夭折。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皇太子嘉仁得以在京都紫宸殿践祚。日本著名政治史专家升味准之辅称之为世袭君主制的“阿喀琉斯之踵”，即“致命的弱点”。

嘉仁登基成为第123代天皇后，改元“大正”。“大正”年号典出《易经》第十九卦中的“[大亨](http://www.wiki.cn/wiki/%E5%A4%A7%E4%BA%A8)以正，天之道也。”成年后，嘉仁天皇娶九条节子，即贞明皇后为妻，生有四个儿子，即裕仁、秩父宫雍仁亲王、高松宫宣仁亲王、三笠宫崇仁亲王。

大正天皇嘉仁年幼时患过脑膜炎，精神不甚健全，40岁又患脑血栓并影响脑神经，导致精神不正常。病情发作时，贵为天皇却常在大庭广众面前有令人啼笑皆非的举动。例如，一次在观看军事演习时，嘉仁天皇会突然跑下检阅台，打开士兵的背包翻看究竟。再例如，有一次在国会议事堂听取臣下奏告并拟发表演说，突然心血来潮，一边傻笑一边把讲演稿卷成圆筒当“望远镜”到处“眺望”，醸成贻为笑柄的“望远镜事件”。嘉仁还自幼骄横傲慢，性格暴躁，容易激动，一不高兴就用马鞭抽打他的侍从。同时，大正天皇还特别崇拜洋人，尤其崇拜日耳曼人。大正天皇平日里留着德皇威廉二世那样的牛角胡子，胡子上还涂满凡士林，平时的穿戴也模仿德国骑士。日本政府元老感到，嘉仁作为日本天皇，实在有损日本国格，便于大正十年（1921年）发表声明称，嘉仁由于年幼时患过脑炎导致脑力衰竭，无法理政，由皇太子裕仁（昭和天皇）摄政。

1926年底，大正天皇驾崩，享年48岁。70多年后，日本有学者提出，大正天皇虽然幼时却曾患过脑膜炎，但是青年时代已恢复健康，精神健全，所谓的“望远镜事件”纯属谣言。真相如何可以继续探究，但有一个现象耐人寻味：天皇驾崩后要根据各方面的资料编撰《XX天皇实录》作为官方记录。《大正天皇实录》是由当时的[宫内省](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74619)在1937年编写完成的，和1968年全文出版的《[明治天皇](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57264)实录》相比，《大正天皇实录》的内容并不透明。在第一和第二次公开的共计29册《实录》中，有640处地方被涂改破坏。其中有些部分甚至被数行数行得消去。第三次公开一共9册643页，有约250处被涂黑。

日本有嘉仁作为天皇，或许是不幸的。但是嘉仁在位期间，**欧洲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大量西方商人转赴“殖产兴业”后的日本投资，使日本呈现一片繁荣，民主浪潮兴起，民主气息浓郁，使大正时代以“大正民主时代”著称**。下节课，我谈一下：一战：“日本的天佑”

**2、一战：“日本的天佑”**

1911年10月24日，日本内阁通过了题为《关于对中国的政策》的决议。决议申明：“为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帝国政府必须不懈地进行策划，倘遇可乘之机，自应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利用。” 寻找“可乘之机”，成为日本外交的重要内容。

以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费迪南德大公遇刺的“萨拉热窝事件”为导火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使日本取得了可乘之机。

8月3日，英国政府通过驻日大使格林向日本政府提出：“如果战争波及到远东，香港及威海卫遭到袭击，英国政府相信日本政府将予以援助。”8月4日，英国对德宣战。

8月7日，英国请求日本协助其攻击以中国山东半岛胶州湾为根据地、袭击英国商船的德国舰队。大隈内阁接到请求后，当天彻夜开会研究。经过讨论，日本内阁决定参战，并将参战理由定为：“由于战乱余波涉及东亚，日英同盟之目的濒临危险。”

8月8日，应大隈内阁的要求，山县有朋、松方正义、大山岩等举行元老会议，井上馨因为病后休养，没有参加元老会议，但让秘书送去了书面意见，提出这场战争是日本发展国运的“天佑”，即天赐良机，主张日本和英国、法国、俄国密切协作，确立“日本在东洋的利权”。

8月9日，英国政府收到了日本政府同意参战的备忘录，其中写道：“一旦成为交战国，则日本之行动即不能仅限于击沉敌国之伪装巡洋舰”；“也就是说，为了破坏可能使日本及英国在东亚利益遭受损害的德国势力，必须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手段和方法。”接到这一备忘录，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当天下午即向日本政府表示，希望日本暂停军事行动。因为，英国意识到，日本援助是假，借机扩张势力是真。请日本帮忙，那是“请黄鼠狼看鸡窝”。

8月10日，加藤高明对英国政府强调，日本没有领土野心，何况日本内阁已经作出参战决定，改变这一决定将招至重大政治危机。由于日本执意参战，英国政府只能答应，并要求日本声明不攻击德占区以外的中国地区，不在中国南海及太平洋采取战斗行动。但是，加藤高明拒绝在宣战布告中发表限制战区的声明。最终英国政府只能妥协。

8月15日，日本军政要员举行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参战，并向德国发出了最后通牒，限8月23日正午作出答复。最后通牒的内容是：（1）德国舰队须立即撤离日本及“中国海”区域，不撤离者将被立即解除武装；（2）在9月15日之前无代价、无条件地将胶州湾租借地移交给日本，由日本交还中国。

就在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的当天，英国驻日公使朱尔典提议，在日英两国共同发给中国政府的照会中写明“保证归还胶州湾”，但遭到加藤高明拒绝。加藤高明表示，目前无法作出这种保证，届时即便要归还，由于日本付出了很大牺牲，也必须附有条件，称：“例如延长满蒙租借地以及延长铁路使用期限等，恐怕将成为主要条件。”

8月20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会见了中国外交总长孙宝琦，无理要求将山东省黄河以南划为日本对德“作战区域”，要求中国军队自胶济路撤退。但中国政府不同意，为了避免和日本交恶，中国政府另外划了一条战线，“由胶济路潍县以东至青岛”，并提出“可由日本随便布置”，“希日政府明我好意，勿采取过分举措”。但日本根本置之不理。

8月23日，不出所料，德国没有对日本的最后通牒给予答复。于是，日本便组建了以第18师团为主力、大约51700人的部队，在大约2800名英军的配合下，对德国在中国胶东半岛的租界采取了军事行动。

9月12日，日军占领即墨，25日占领潍县车站，10月6日占领济南车站，将胶济路全线占领。

占领青岛及控制胶济线后，日本内阁决定，在欧洲战争未结束前，青岛及山东战区一律实行军事管制，在青岛守备司令下设立军民各级官吏，山东省路矿均由该司令监督，海关也派日本人管理。

1914年11月11日，即攻克青岛不到一周，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召集临时内阁会议，讨论对华方针，形成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

中国的舆论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并谴责中国政府的软弱。面对各界压力，12月7日，中国政府通告日本，称青岛已下，中国境内战事已经结束，请日军立即撤出胶济路沿线。1915年1月7日，中华民国政府声明取消山东战区，日本认为此事未同日方协商，不受此项通知的约束，仍用军事管制的办法强占中国领土。

1915年5月18日晚，根据外相加藤高明的训令，日置益越过中华民国外交部，直接跑到中南海怀仁堂面见袁世凯用半是威胁，半是利诱的语调说道：“日本政府对大总统表示诚意，愿将多年悬案和衷解决，以达亲善目的。兹奉政府训令，面递条款，愿大总统迅速商议解决，‘并守秘密’”。说完，将“二十一条”放在桌子上走了。而袁世凯则始终一言不发。二十一条共有五号档构成：其中最关键的第五号档。按照第五号档，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等等。  
 为了跟日本人周旋，袁世凯指示负责谈判的陆征祥等采取“联合欧美，抵制日本”的外交策略，主要从四方面着手：一是摸清日本的底牌，以确定“二十一条”谈判的方针和对策；二是在谈判中采用拖延战术；三是向西方国家特别是美、英及报界秘密透露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欲独霸中国权益的计划；

四是借助民众的压力向日本政府施加影响。袁世凯指示知情者故意将内幕透露给中外报界，以鼓动舆论对日本施加压力。

5月7日下午3时，日置益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期望中国政府至5月9日6时为止，给予满意答复。如到期不给予满意答复，则帝国将执行认为必要之手段。”在发出最后通牒的同时，日本政府派兵至青岛、沈阳等地进行武力示威。中国被迫签“天下之盟”。5月9日上午11时，陆征祥、曹汝霖、施履本前往日本使馆告知结果。三人一路心境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

二十一条谈判，从1915年2月2日开始，到同年5月7日日本发出限48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结束，历时105天，谈判20余次，至5月9日期限的最后一刻，中国政府被迫屈服。五月二十五日，陆宗祥与日置益正式签署了实际只有“十二条”的所谓二十一条。由于该条约签署于民国四年，故史称“民四条约”。

“一战”不仅使日本外交出现新动向，而且使日本政治经济发生深刻变化。下节课，我将讲一讲一战后日本政治经济的变化。

**3、“平民首相”和战后发展**

1913年2月11日，日本元老会议推荐山本权兵卫出任首相。山本权兵卫执政后修改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规定陆海军大臣可以从退役或预备役的陆海军大将或中将中挑选。这项改革对军阀官僚专制构成了有力冲击。8月1日，山本内阁对文官任用制也进行了改革，原则规定通过文官考试，民间人士也可以成为官僚。**文官制的改革为民间人士、政党成员进入官僚上层打开了通路，为政党政治的最终确立开辟了道路，成为今天日本文官制度的真正起点**。

1918年9月29日，原敬内阁正式宣告成立。虽然原敬按照惯例没有任用政党党员担任外相、陆相、海相，但除了兼任法务相的原敬本人，这届内阁有6名阁僚是政党党员，被公认为日本宪政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政党内阁”。原敬出任首相正值一战刚刚结束。原敬是铁腕人物，执政后采取强有力措施推进各项政策，使社会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当时众议院议员永井柳太郎在众议院发表演说时，对原敬作了这样的评价：“今日世界仍是主张阶级专制主义的世界。西有激进派政府的列宁、东有我们总理大臣原敬。”“西有列宁，东有原敬”因此成为流行一时的名言。

由于大正天皇存在智障，首相原敬成为主理国家政务的核心人物。原敬内阁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均推行了“积极政策”。1918年10月11日，即组阁后约两个星期，原敬在东京商业会议所举行的午餐会上，首次公开发表了他的施政演说，显示了他施政方针的大致框架。这些方针随即在第41届帝国议会上获得通过。概括而言，就是“四大政纲”：

一、充实国防。原敬内阁按照1918年6月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推进国防建设。陆军根据一战的经验，加强机枪、火炮、战车、飞机、通信机构、汽车等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并顺从元老和陆海军官僚的意向，将陆军从19个师团增加到25个师团；海军针对美国海军实力的增强，提出了扩大“8·8舰队”的构想，即将原来各由8艘舰龄在8年以内的战舰或装甲巡洋舰为主力编成的两支舰队，扩大为同种军舰的三支舰队。

二、振兴教育，特别是充实高等教育和实业教育。明治以后，日本初等和中等教育获得了很大发展，但是高等教育相对滞后。例如，1917年文部省直属学校的入学率仅为18％。原敬内阁登台伊始，即在立法、行政等多方面采取措施，包括制定鼓励私立学校发展的法规，使高等教育入学率不断上升。同时，原敬提出了1919年至1924年充实官立高等教育机构的6年计划，具体内容是：创设新潟、冈山、千叶、金泽、长崎等5所医科大学；建立东京商科大学，即今天的一桥国立大学；帝国大学创设4个学部、扩充6个学部；积极承认庆应义塾、早稻田、明治、法政、中央、日本、同志社等专门学校升格为大学；创建弘前、松江、东京、大阪等10所高级中学；创建横滨高等工业专门学校、金泽高等工业专门学校等17所实业专门学校；创建富山医药、大阪外语2所专门学校；扩充2所实业专门学校。需要强调的是，原敬“振兴教育”的政纲具有划时代意义。今天日本高等教育的基本构架，就是在当时开始正式形成的。

三、整顿交通设施，特别是发展和改善铁道交通事业。“整顿交通设施”是原敬的一贯主张和抱负，也是政友会的政策核心。在1919年之1921年3年间，原敬的这一抱负基本得以实现。在此之前，日本铁道因1892年制定的、以军民两用为主要目的的《铁道铺设法》，以及1906年制定的、以大量收购“私铁”的《铁道国有法》而得以发展。原敬内阁时期，铁道发展面临两种选择：或将一部分骨干改成“宽轨”增强运力，或维持“窄轨”原状，着力构建全国铁路网络。也就是说，究竟是“抓重点”，还是“抓普及”的选择。最后，以“速成普及”为旗帜的政友会的主张取得了胜利，决定首先致力于构建全国铁道网。在大选获胜后，5月15日，铁道院升格为铁道省，元田肇出任第一任铁道大臣，领导铁道建设。当时提出的主要规划是：除了抓紧建设12处骨干和轻轨外，新增7条总长为917公里的骨干和533公里轻轨线，同时加强复线建设，计划10年建成。为此，日本政府决定将1923年以后6个年度的铁道建设费用，提前用于1919年以后的4年。

四、奖励产业，即振兴开发产业及通商贸易。自明治末年即1912年，日本政府持续施行紧缩财政。一战时由于欧洲列强忙于战事，日本对外经济活跃，居留海外的日本人自1913年至1920年的7年间增加了7倍。以此为背景，原敬内阁着力振兴开发产业和通商贸易。所采取的政策举措，对日本进入战后重工业和和化学工业现代化时期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对日本对外经济扩张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为首相，原敬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政党内阁”首相，同时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遇刺身亡的现任首相。大正十年（1921年）11月4日晚上7点，原敬离开位于东京芝公园的邸宅后，于7点20分进了东京车站站长室，与先已到达的铁道相原田肇、文部相中桥德五郎、内阁书记官长高桥光威会合，打算乘车前往第二天在京都召开的他担任领袖的政党立宪政友会近畿大会。在离开车还有6分钟时，一行由东京站站长高桥向导往检票口走去。突然，一个手持短刀、个子矮小的光头男子从斜里杀出，举刀朝原敬右胸猛刺一刀。原敬悄然倒地，脸色苍白。原敬侧近见状，急忙将原敬抬入站长室放在桌子上紧急施救，但65岁的原敬终因失血过多，于7点33分停止了呼吸。

被当场扭获的凶手叫中冈良一，是大冢车站的扳道工，18岁。中冈良一因为对立宪政友会的一系列作为强烈不满，并受国粹主义者朝日平吾9月28日刺杀安田财阀创始人安田善次郎事件的刺激，起意刺杀原敬。

原敬虽然事先根本没有料到会在这天晚上遇刺身亡。但是，作为身处险恶环境中的政治家，原敬早在当年2月20日已写好了4封遗书，1封关于葬礼安排，另3封关于遗产分配。

虽然原敬遗嘱不要在东京举行任何仪式，但是立宪政友会仍于11月7日举行了迎接原敬灵柩仪式和告别仪式。中午11点25分，原敬的灵柩从他的住所到达立宪政友会总部时，许多民众自发前往吊唁这位“平民首相”，向原敬遗体敬香告别的行列长达200多米。葬仪由葬仪委员长、原敬内阁藏相高桥是清主持。仪式结束后，原敬的遗体由当天晚上10点从东京上野发出的急行列车拖挂的灵柩车送往他的故乡岩手县首府盛冈市。据当地报纸《岩手日报》报导，从盛冈车站至原敬老家谷川端，迎接遗体的群众约有4万人。9日下午1点，原敬灵柩离开他的老家前往他家的菩提寺大慈寺下葬，参加葬礼的达3万人。按照遗嘱，原敬的墓碑上仅有 “原敬之墓”4个字，没有任何头衔，由原敬一手提拔的立宪政友会总裁秘书、贵族院敕选议员小池靖书写。

原敬被刺后，他领导的内阁于翌日宣布总辞职。“第一个真正的政党内阁”就此结束了历史使命。但是，他留下的遗产对日本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正反两方面影响。

**原敬是强势和“专制”的，但是大正是和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在日本历史上，唯一和民主有着不解之缘的，就是大正。下一课，我就谈一谈“大正民主”。

**4、“大正德谟克拉西”**

“大正民主”又称“大正德谟克拉西”，是指[1912年](http://baike.baidu.com/view/104407.htm)至[1926年](http://baike.baidu.com/view/673016.htm)，即日本大正年间所推行的、符合现代[民主](http://baike.baidu.com/view/14448.htm)的[政治体制](http://baike.baidu.com/view/118328.htm)与[政策](http://baike.baidu.com/view/15030.htm)。例如，我上节课谈到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定改革、文官制的形成、政党内阁的建立等，均属于这一范畴。同时，大正时代又是各种社会政治思潮异常活跃的时代。了解这些思潮的**性质和演变**，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什么在经历了“民主时代”后，日本会掀起军国主义狂潮，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战争策源地。

大正时代主要有六大思潮：

一、国家主义、皇室中心主义思潮。对明治国家的设计者而言，所谓国家，就是以天皇为核心、由**国民道德支撑**的超个人机构。培养**忠君爱国思想**，是国民道德教育的基本使命。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后，由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中村正直、“帝师”元田永孚和法制局长官井上毅拟定的《教育敕语》）虽然仅300多字，但却是对儒教、佛教、立宪主义、爱国主义等多种价值观中最具有普遍意义的因素的提炼，其核心思想就是“忠君爱国”。

大正时代的国家主义、皇室中心主义思潮的中心人物是德富苏峰。德富苏峰一生历经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并始终处于理论界核心地位，在每个时代均经历巨大转折和演进：明治时代，德富苏峰从主张全面欧化、“平民主义”转为“国家主义”、“皇室中心主义”；大正时代则着力将“皇室中心主义”和“国家认同”结合以求达到“举国一致”；昭和时代则鼓吹军国主义和侵略扩张主义。

二、超国家主义思潮。超国家主义思潮的突出特点，就是主张对国家进行“改造与革新”，其主力是主张“革新”的右翼团体，如日本最早的“革新”右翼团体“犹存社”。犹存社的核心人物是被称为“日本法西斯主义鼻祖”的北一辉。

北一辉一生撰写了三部重要著作：1906年出版的《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1916年出版的《中国革命外史》、1920年出版的《日本改造案原理大纲》。这三部著作使北一辉被称为“**大正时代提出了最完备、最系统的‘国家改造’方案的思想家**”。

《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中所谓的“国体”，就是建立具有合理的“社会制裁”体制的“世界性大政府”，基于“人道之大义”引导“世界万邦”。这一“大政府”当由“君子之国”日本建立，而要建立这样的大政府，“首先要增强本国国力，确立文明之基础，上下一致，君臣联合，而后将其志向推广至全世界。”北一辉认为，由于日本的“天皇”与“国体”之间可以划一等号，因此 “国体论”的核心是“君民一体”。所谓的“纯正社会主义”，就是对内实现生产数据公有、公营、公平分配；对外以消灭国际间竞争为目标。

《中国革命外史》是北一辉经历了中国革命实践后的理论结晶，主要表露了一个思想：以“革命的中国”为认识基础、提出理想的日本对外政策即“革命的对外政策”，是构建超国家社会秩序的有益补充。

《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是北一辉超国家主义理论的代表作。该书强调废除宪法，废除华族制度，实行普选，建立“国家改造议会”，推行公有制，限制私有制，保护民众的各项权利包括人权。北一辉强调，国家改造的手段是“武装政变”，施行“国家改造”方案的指导思想是“超国家主义”或称“极端国家主义”。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生的一系列政变和暗杀活动，和北一辉的思想有重大关联。1936年“二·二六政变”后，北一辉被逮捕并于1937年被枪杀。

三、民本主义思潮。 1912年5月27日，茅原华山在《万朝报》上发表了《民本主义的解释》一文，提出“民本主义”是与“贵族主义、官僚主义、军人政治”等对立的政治思想。因此茅原华山被认为是民本主义的首倡者。

在各种民本主义思想理论中，赋予民本主义以体现时代精神的解释，并对“民本主义”系统进行理论阐述的，是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著名的政治学者和思想家吉野作造。

1915年，吉野作造在《欧美宪政的发达及其现状》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民本主义”概念。1916年，吉野作造发表了《论宪政主义和对宪政主义的彻底贯彻》一文，对民本主义作了如下解释：民本主义实际上是“德谟克拉西”（民主主义）的译语，所以采用这一译语，主要是避免同“主权在民”混同，从而与“主权在君”的明治宪法精神和日本国体发生抵触。吉野作造强调，民本主义不涉及主权的“拥有”，只涉及主权的“运用”。吉野作造倡导的民本主义思想，很快成为“大正民主”的指导思想，并为二战后的民主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在19世纪末，共产主义传到了日本，并逐渐成为一股反现实政治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片山潜等。1910年5月，幸德秋水等数百名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因涉嫌“谋刺”天皇被捕，史称“大逆事件”。第二年1月，幸德秋水等12人被判死刑，另外12人被判无期徒刑。自此，日本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严冬时期”。

大正时代社会主义运动重新活跃。堺利彦、山川均、河上肇等创办了多种杂志，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他们创建了“日本社会主义同盟”，1921年组成日本共产党筹委会，制定了党章和宣言，设立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1922年7月，日本共产党宣告成立，堺利彦当选为日共第一任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同年，片山潜代表日共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一直在共产国际工作。1923年，日共中央理论刊物《赤旗》创刊并迄今仍是日本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同年6月，日本共产党遭到“集体起诉”，几乎溃灭。1924年2月，日共宣布解散。

五、理想主义思潮。理想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是武者小路实笃。武者小路实笃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倡导“新生活”运动和“新村”运动。同年11月，他在九州岛宫崎县日向地区购置土地，创建乌托邦式的理想国“新村”作为实践“新生活”的场所，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被同为白桦派作家的有岛五郎称为“应该到来的新时代的奠基人”。

六、无政府主义思潮。日本大正时代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大杉荣。大杉荣既强调人的生物属性，也强调人的社会属性，而这两种属性的共同要求，就是实现自我，反对束缚。大杉荣的无政府主义观念在他著名的“白纸主义”中有精辟论述。他写道，“人生决不是事先固定下来的、书写整齐而存放在那里的一本书。它是需要每个人逐字逐句填写的一本空白的书。”

1923年9月16日大杉荣去世后，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也逐渐消失。

上述思潮或兴或衰，对日本以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正是国家主义、超国家主义、皇室中心主义思潮等具有极端民族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引导日本在一战后不断扩张，并引起而美国的担忧。为了扼住日本这匹“脱缰的野马”，美国试图设立一个羁绊——华盛顿体系。下一课，让我们一起了解华盛顿体系。

**5、华盛顿体系和币原外交**

在一战后重新安排世界秩序的巴黎和会上，日本提出了两项要求：（1）要求获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基本权益；（2）要求获取赤道以北原德国领的南洋诸岛，显示出强硬立场：如果日本要求得不到满足，将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美国等西方列强遂作出让步。4月30日，美、英、法、日四国全权代表会议认可了日本对中国山东省的要求。5月4日，日本发表了接收德国在山东权益的声明。

日本在中国登堂入室不断扩张，引起了美国的担忧。面对英国势力衰退、德国一蹶不振，法国遭受重创，如何抑制日本在中国和远东的扩张，将日本纳入列强协调的体制，确保美国在中国的“经济自由”，日益成为美国外交的一项紧迫课题。另外，日英同盟的存在，对日益激化的日美矛盾，显然是一个潜在威胁。鉴于为期10年的第三次英日同盟将于1921年7月12日到期，而英国对是否续约正举棋不定，美国认为，这一机会应该利用。更重要的是，美国参议院虽然否决了《凡尔赛和约》，但是却通过保留条款的形式公开声明，不承认《凡尔赛和约》中规定的、由日本接收德国在中国山东权益的条款，提出美国对中日间引起的争端，“有完全自由之行动权”。

1921年7月11日，以上述动向为背景，美国总统哈定向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发出了举行国际会议，商讨限制军备、中国山东问题、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安全问题。这一提议得到了日本政府的赞同。1921年11月12日，以限制军备、协调列强在远东及太平洋利益的会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独立纪念馆召开，史称华盛顿会议。这次会议建立的所谓“华盛顿体系”极大地遏制了日本在远东的扩张势头。正如信夫清三郎所指出的：“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对日本取得胜利。由1922年2月3日签订的裁军条约、九国公约等诸条约所构成的华盛顿体系，否定了大战期间日本以武力威胁为背景在中国所获得的特权地位。”具体而言，华盛顿体系令日本极为不悦，主要是以下几项内容。

第一，英日同盟1解散。由于英国是美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争霸的另一个主要对手。因此，美国处心积虑地想拆散英日同盟。在美国主导下，1921年12月13日，美、英、日、法四国签署了《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史称“四国协议”）。四国协议的签署是美国外交的一项重大胜利。美国代表团1922年2月9日专呈总统哈定的报告中写道：“英日同盟的适时解体及签署新条约新约，是美国代表团最欢欣鼓舞之事。”

二、日本独霸中国的梦想破灭。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日、意、荷、比、葡、中九国签署了《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史称“九国公约”），共九项条款，主要内容是：1、维持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2、为中国自身建立和维持稳固的政府提供充分机会。3、维持各国在中国获取商业、工业权益的机会均等。4、反对寻求有损于“友好国家”国民权利的特权，以及采取利用中国情势损害“友好国家”的行动。“九国公约”再次确定了美国提出的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是美国外交的又一重大胜利。

三、迫使日本“将《凡尔赛和约》中吞下的赃物重新吐了出来”。1922年2月4日，中日两国代表签署了《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共28条内容，规定：日本将胶州租借地归还中国，具体涉及撤退日军、移交公产、矿山、盐场、海关等。

四、签署《五国海军协议》将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主力舰吨位的比例规定为5:5:3:1.67:1.67，限制日本海军军舰特别是主力舰的发展。

美国不仅竭力限制日本在中国的扩张，而且还提高本国门坎，限制腿短的日本人顺利进入。早在1913年5月19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就主要以日本人为对象，提出了限制“不能归化的外国人”土地所有权及租借权的法案，引起日本政府抗议，一度使日美关系相当紧张，甚至有美国内阁成员担忧日美可能开战。此后，双方就此问题进行了多次交涉，但并无收获。1921年至1924年，包括加州在内，美国共15个州制定了此类法案。1923年12月，美国政府向下院提交了新移民法案，内容包括禁止不能归化的外国人入国。获此信息，日本驻美国大使埴原正直即向美国国务卿休斯提出书面交涉，希望美国政府关注这一问题。由于信件最后有“grave consequence”（严重后果）一句，美国参议院议员洛奇认为，这是对美国进行威胁。他表示：“作为由大国的代表致友邦的档，日本大使的信件不甚稳妥。我认为该信件有含蓄的威胁（veiled threat）。美国的立法，不能为外国隐含的威胁所左右。我认为，此刻应该让全世界知道，什么人能够进入美国和成为美国公民，当由美国独立决定。1924年5月15日，美国国会下院以308票对62票、上院以69票对9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包括“排日移民条款”的新移民法。日本驻美国大使埴原正直随即向首相递交辞呈，并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在新移民法正式生效的7月1日，1万余名日本民众聚集东京增上寺，举行反美国民大会表示抗议。

美国敢对日本说不，可日本还真不能不把美国当回事。华盛顿体系的建立使日本赤裸裸的军事扩张受阻，迫使其不得不改变战略，通过较隐蔽的经济扩张，获取“在华权益”。1924年6月币原喜重郎出任外务大臣后，在就任外务大臣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日本将遵循并扩充巴黎和约及华盛顿会议诸条约、诸决议等所明示或暗示的崇高精神，努力完成帝国的使命。”之后，币原喜重郎开始致力于推行所谓的“协调外交”即“币原外交”。按照日本外交史家信夫清三郎的观点，“外相币原喜重郎的外交，虽以币原之名称为‘币原外交’，但其胚胎形成于原敬的国际协调外交。原敬的国际协调外交是，为了顺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形势，把对华排外性隶属化政策，转换为用资产阶级的合理方法来维护帝国主义在华权益的政策，特别把对美协调作为国际政策的核心。”

币原外交对华政策的要点，是强化在中国的经济渗透和扩张。数据显示，1914年列强在华投资的排名，英国第一、俄国第二、德国第三、日本第四、法国第五、美国第六。但是1920年，日本在华投资总额增加到4.664亿美元，比1914年增加了108.21%，占各国对华投资总额的比重上升至23.12%，从原来的第五上升至第二。 1924年，日本向驻华使馆新增派了专门负责商务、金融、运输的官员。

但是，列强同日本在华经济利益的争夺，使这种经济扩张渗透战略难以为继。特别在日英同盟被解除后，日本和英国的矛盾日趋恶化。1925年至1927年，英国和中国产生摩擦时，日本始终袖手旁观，而两国围绕中国市场和原料产地展开的争夺更是日趋激烈。20世纪20年代初，英国是中国的最大贸易对象国。但是至20世纪20年代末，英国的这一地位为日本取代，从而对日本极度不满。同时，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广泛而大规模展开的抵制日货运动，使日本和中国的矛盾不断加深。中国政府一些维护民族权益对措施，也激发了民族主义的高扬。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随着田中义一出任首相兼外相，“币原外交”被“田中外交”取代。下节课，我们谈一谈日本裕仁登基、田中登台，日本一步步武力侵犯中国的情况。